

林 岗 著

明清之际 小说评点学之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林岗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7

ISBN 7-301-04373-2

I. 明… II. 林…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4233 号

书 名: 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

著作责任者: 林 岗 著

责任编辑: 马辛民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373-2/I·0551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5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66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2.80 元

值,发现这是一个有内在思维理路、大体完整的评点学批评体系,并将其分为结构论、文理章法论、修辞论三个核心层次,统一在“文本意识”之下,分别对这三个层次的内涵意义作了精当的论述,使明清小说评点学显示出某种新的意义,从而对 80 年代的同类研究构成了一种突破,有助于认识这种诗学文体“背后”的社会文化缘由。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林岗在著作中除采取实证的方法外,还运用了中西比较研究方法,他把明清小说评点所体现的美学观念同西方叙事文学的美学观念作比较分析,并由此而追溯到中西哲学宇宙观的差异。在展开阐述自己的思路时,做到既努力探求古人的“文心”,又注意挖掘古人论点的现代意义,体现了 20 世纪末学术研究的特色。

《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虽是林岗这几年写成的,但他对这个论题的关注并非是近期的事,而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他在 90 年代初曾先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研究一年,在美国访问研究期间,他所做的也是与这一论题相关的研究,已发表过相关的论文多篇,其中有的收入他新近出版的《边缘解读》一书中。林岗作为一个 80 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面对急骤变化的社会现实和各种各样学术思潮,他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见解和态度,显然是一个有思想和多思、善思的人,为此,我特别喜欢他。我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有更多的人了解他,了解他内在的学术活力和有创意的学术见解。

饶芃子

1999 年 1 月 8 日于暨南园

第一章 序 论

明朝自弘治(1488—1505)以后,由文人改编、修订、增删、整理、出版先前民间流传的平话、演义等所谓“稗官小说”的活动渐趋活跃,特别是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19)两朝,这种文学活动达到了历史上最繁荣的程度。文人对民间的原始素材、先行故事的加工修订,不同于今天由作者个人单独进行的文学创作。它一方面是修订者、整理者的个人努力,正是这些文学素养良好的文人参与修订、整理,才将故事提高到具有完整而自觉的艺术构思的水平;另一方面先前民间流传的底本也提供了充分的基础。这种在流传底本基础上修订、整理的文学活动是那个年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式。我们今天读到的明代最脍炙人口的几部作品,都是在这—阶段最终定形并以“最完整的形式流传于世”。^①《水浒传》的版本繁杂,根据明人的笔记资料,嘉靖年间已有包括一百零八条好汉全套故事的百回本流传。^②但嘉靖本现今只有残本传世,不能窥见全豹。现存的全本繁本《水浒传》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和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刻印的一百二十回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滸全传》。《三国演义》的版本流传情况更加复杂,目前所见最早的是“嘉靖本”,但现今留下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的一篇序文,写于弘治七年(1494)。“嘉靖本”之后,各种翻刻本不断问世,可谓争奇斗艳,层出不穷。《西游记》最早的刻本是万历二十年(1592)陈元之序的世德堂本,

后天启、崇祯间又有叶昼托名李卓吾批评的足本《西游记》。《金瓶梅》最早刻本出现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为东吴弄珠客作序的《金瓶梅词话》,后有崇祯绣像本。除了以上四种被清初及后来人称作明代“四大奇书”之外,^③还有冯梦龙改编、整理民间流传故事和仿话本体例创作的“三言”,以及凌蒙初创作的“二拍”。这两种书均出版于天启、崇祯年间。以上所提到的只不过是明代中晚期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如果我们不是狭义地理解文学创作,此足以证明有明一代的中晚期是历史上“稗官小说”纷陈杂呈的繁荣时期。

“四大奇书”之中,除《西游记》、《金瓶梅》可定为嘉靖、万历间作品而无甚争议外,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出现的年代,哪怕一个比较模糊的年代界定,在学术圈内都远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一般把它们定为明初作品,更有的定为元末作品。^④浦安迪主要根据现今这两部作品的版本流传情况,根据作品本身的体例和它们的长篇虚构叙事文的文学特征,而不是根据前人只言片语的记载或作者一鳞半爪的生平资料,将嘉靖、万历年间定为它们以“最成熟的面貌问世”的时间。^⑤也就是说,明代的中晚期代表了两部作品版本演化史上最重要的时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作品样貌就是那时文人修订、整理的结果。在确定“四大奇书”版本演化年代的基础上,浦安迪提出“16世纪文人小说”(literati novel)这一富有启发性的概念。他的核心看法可以综合如下: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小说文类,是一种书香文化界的产品而不是一种只流行于下层社会的民间作品;这个看法并不否认文人小说脱胎于通俗的民间故事、平话和说书,而在于强调明文人熔铸、改造民间传统,从中创造出崭新的散文小说文体。因此,这些文学体裁反映了文人的思想抱负、美学趣味,其字里行间的遣词造句,字缝里的深远寓意,也要从文人惯用的技巧修辞手法获得解释。^⑥浦安迪将“四大奇书”看成是严肃小说而不是通俗小说,这对本文将要讨论明清之际

的评点学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事实上,浦安迪也坦率承认他关于文人小说的看法得益于那个时代的小说评点家。评点家早已指明读者不可以将这些天地之间的“妙文”视作弹词、平话一类的东西。

是否将“四大奇书”和类似的作品称作“文人小说”可留待讨论。但这些小说有相当浓厚的文人色彩和文人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在浦安迪论点的基础上,将问题扩展到探讨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稗官小说的不时冒出和评点家对它们的持久兴趣在这里牵涉到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知名和不知名的好事者修订、改编、整理那些先前不见经传的稗史小说和后来评点家对这些新出现版本的热心评点,都属于明中晚期和明清之际文人文化的现象。我们只有在这个视角下观察作品及其评点,才可能作出符合事实的解释。如果我们不是循文人文化现象而是从通俗文化的视角看待它们,就会有許多地方解释不通。例如对小说表现出来的文人价值观和美学趣味的把握,评点家对小说本文释义作出的种种褒扬和贬斥,就不可能有通透的认知。第二,随着完善版本的出现和流传,评点家继起对之评点,表现了他们对文人价值观和美学趣味的认同。笔者有理由相信,评点家所以评点作品,与我们今天以文学批评为职业的学院式风格有很不相同的思想文化背景。他们不是站在职业的立场批评作品,而是站在文人的立场批评作品。评点家对文本的读解与文本本身价值观、美学趣味是一致的。这种对文本在深入认同基础上的批评,使得我们在远离古人的今天如果冀图重构评点家的批评体系,就必须紧密结合评点家当日所依赖的文本。本文的任务虽然只是探讨批评文本,但笔者深知其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却取决于对作品文本的读解。因为两者所流露的世界观和趣味实在有太多的一致性。它们都是文人的产物。

小说评点大兴于明清两代,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本文标出

“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意在把这个时期的评点学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而加以研究。继好事者修订、改编、撰写稗官小说，对这些文本的诸家评点也稍晚面世。现存最早而完整的小说评点当数容与堂本《水浒传》，后又有袁无涯刻本。由于两本都题李卓吾批评，孰真孰伪，至今仍未有一致的意见。^⑦不过，究竟何本是李贽所批，抑或二本均非李贽评点，对我们探讨该时期的评点学并无重大影响。两本相较，一般认为容本评点比袁本更高明。^⑧崇祯十四年(1641)，金圣叹终于完成积十数年心血批点而成的贯华堂本《水浒传》，以《贯华堂第五才子书》的名目刻印刊行。金本问世，光芒覆盖他本。有清三百年，金本成为唯一的通行本，人只知有贯华堂本而不知有他本。入清后顺治十五年(1658)，金圣叹又刊行他晚年呕心沥血之作《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即金本《西厢记》。金圣叹的这两种评点都可以说是明清评点的扛鼎之作。《三国演义》的评点本，现存有余象斗、叶昼伪托李卓吾、钟惺、毛纶和毛宗岗父子、李渔五家。诸本之中，李渔评本最晚出。^⑨而李渔没于康熙十八年(1679)，批点当完成于此。毛氏父子批点《三国演义》约完成于康熙五年(1666)。^⑩毛氏父子评本的影响也如金本一样，此评一出，诸本尽废。张竹坡评《金瓶梅》本即《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刻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由于张所据的是崇祯绣像本，张评本一出，人几不知有词话本。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重新检得词话本，世人方知还有更早的刻本。除上述评点本之外，还有陈继儒批点《列国志传》、徐渭批点《隋唐演义》、钟惺批点《东西两汉全传》《封神演义》《夷坚志》、汤显祖批点《艳异编》《虞初志》、叶昼托名李卓吾批点《西游记》、冯梦龙批点《情史》《石点头》、剑啸阁批点《隋史遗文》等。明清之际，文人谈论他们对稗官小说见解的，除了评点还有一批序跋、笔记、散论等。以上提到的诸种评点文字，当然仅仅是勾画了明清之际评点圈子的大致轮廓。但从这个粗略的轮

廓也足以看出,文人批点那些圣人不齿的稗官小说,确在那时蔚成风气。谓之批点热,恐怕不为过分。

从上述简单罗列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看法。第一,前所未有的对批点小说的热衷,是继诸种作品问世之后开始的。说明文人的兴趣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作品的感染。作品道出了他们心中的喜怒哀乐,传达出他们的人生感叹,故有此批点,能够形成一时的风气。第二,评点小说的风气跨越晚明延至清初。这当然是晚明风气的延续,或者说清初的评点只是晚明的余绪。清初社会风气正在改变,士人如顾亭林、王船山等提倡经世致用,力纠明代的疏狂无学。加上清前中期康熙、雍正、乾隆均是有为勤政的君主,再配以防范、钳制的文化政策,文化思想方面的活泼生气逐渐沉寂;人主风之于上,士大夫倡之于下,清代社会和士林中的这种新风气本不合适评点学的生长。而清初仍然有水准相当不错的评点出现,这当然要追溯到晚明的风流余韵。评点大家之中,金圣叹和毛氏父子是由明入清的人,晚明的烙印自不待言。金圣叹纯粹是一个晚明文人的思想、习惯、性格无一不显示出晚明特性。毛氏父子拘紧不少,思想性格与金圣叹亦有不同之处,但他们崇拜圣叹,并以金圣叹为师法榜样。只有张竹坡生于康熙九年(1670),与晚明无甚直接瓜葛,但其时去明未远影响仍在。至于晚明的风气对他造成的具体影响,我们今天虽然不能确知其详,但从他对《金瓶梅》文本读解之中,可以推测大略。由于批评的滞后,晚明评点热伸延至清初,这就是本文为什么称“明清之际评点学”的原因。但事实上评点的风气是晚明造成的,它的出现要从晚明社会背景中寻找因由,才能解释。而晚明的风流余韵一收结,评点即归于沉寂,亦无有水准的评点问世。这可证明明清之际评点学与晚明社会背景的关系。正是由于它与晚明社会风气的特殊关系,本文将明清之际的评点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提出来,并把

它同清初以后的评点区别开来。在本论以后各章,笔者会逐渐展开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这一概念,以求得对它清楚的认识。第三,诸种评点本流传至今,孰优孰劣,学者们已经得出基本一致的看法。金本《水浒传》和《西厢记》、毛氏父子本《三国演义》、张本《金瓶梅》与容与堂本《水浒传》是其中的翘楚。^⑩笔者承袭这种认识,在探讨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时候,主要根据这几种评点本子而间及他本。对最优秀的这几种批评文本的读解,足可以建立本文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核心观念。

最主要的文人小说即“四大奇书”出现并流传于十六世纪,而最有水准和份量的小说评点则产生于十七世纪。站在中国文论史的立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它在文学的观念理论方面的突破,不体现在传统的正宗文体——诗文,而体现在其时尚属“文体卑下”的新兴文体——小说、传奇。有明一代在传统诗文理论的探幽发微方面,上不及宋元,下不逮有清,是一个比较呆板乏味的时期。无论明中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还是稍后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他们都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诗文理论的原创力,只晓得一味标榜高古,效古法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文学主张,只表示他们诗文识见的鄙下。同期标举“唐宋八大家”的王慎中、唐顺之等“唐宋派”,谈文也没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见解。明后期“竟陵派”钟惺、谭元春诸人,论诗求变更是走入鲁莽灭裂、刻剥古人的死胡同。论诗作文,只有明初宋廉、明中归有光稍有可取,晚明公安三袁“独标性灵,不拘格套”略有新鲜气象。与诗文理论的沉闷了无新意相反,嘉靖、万历以来不为流俗所拘有识有见的文人却在新兴的稗官小说、传奇等文体方面,开了一个前古未见的言说新天地。他们对业已成熟的叙事文体的独具只眼的精辟见解,他们对小说性质、功用、文体特征阐发和洞识,甚至对当时还为相当多士大夫不屑一顾的稗官小说的兴趣,无疑

是代表了明代文论最有生气的一面,代表了明代文论最有创见的成就。当然,这里所谓文论的意思,不是在传统意义说的,而是现今文学理论的意思。

将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放在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宏观历程来考察,如果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理论阐发可以称作第一次“文学的自觉”的话,那么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就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二次“文学的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钟嵘、刘勰诸人论文谈艺辨别文体,厘定标准品评诗文,形成文论史上第一个对文学和文学性认识的高峰。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于现今文学意义的各种体裁还未完备。传奇戏曲还未产生,虽然已有小说一词,但它并非具有一定故事长度的叙事文学的意思。^⑫而自小说、戏曲等新兴文体成熟以来,文人照旧品诗论文对此没有作出足够的批评反应,直到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大盛,这种批评的空缺才填补过来。评点家对“文学的自觉”不是体现在正宗文体方面,而是体现在颇受正统文人歧视的新兴文体。正是存在这一文体批评的补充,古典文论史上对诸种文体的批评才显得完璧无缺。评点家在16世纪文人小说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大致完整的小说批评体系:他们一方面阐发小说文体的文本意识,将小说与史传体文章区别开来,确立小说在文体学上的独立地位,这点颇相似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笔之辨”。^⑬另一方面,他们阐释了小说作为虚构叙事文的文本特性和小说家的各种叙事技巧。这方面评点家的探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追寻虚构叙事文大结构的美学观念,这是在宏观层次把握小说文本的艺术特性;发掘叙事文理的复杂章法,这种探讨颇相似于诗文理论中对“法”的阐释讲求,属于对小说文本细部“肌理组织”的探幽发微;探求小说的语文修辞的笔墨意趣,修辞层次在小说艺术中虽属至微的方面,但评点家却以为这是极重要的一环,他们的探讨创见甚多。笔者认为,这三个层次即结构论、文理章法论、修辞论的阐发

构成了评点家关于“文”即小说的文本特性的理论体系。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作为一种古典的批评体系,体现了以文本为中心的多侧面批评的风格,它既有对“文”的深入探求,又有对“事”的纵横议论。评点中因文而起随事而生的纵横议论也是小说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贯串着“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小说评点对“事”与“文”的相对侧重看似相互分离,而实质在古人“文心”的概念下是统一的。广义地说,小说评点学也是一种叙事理论,它一方面与现代叙事学的基本思想存在相通之处,另一方面也有不同点。它表现出强烈的叙事空间化的倾向。其别具一格的批评形式也是深具中国文化意蕴的。

“文心”是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重要概念,它有二重基本含义:为文者之心(意图动机);文本之心(即核心之心,指文本的文学特性)。而为文者之心又不仅仅与纯粹内心相关,在古人的思想里它是天地宇宙在人心中的见证。所以,“文心”又同天地之心、人文之心紧密相连。评点家自认的批评使命就是通过读解、评点小说重新体认、探究、阐发既至广至大又至隐至微的“文心”。文心浩茫,文心隐微,何处可见?一则想见之于历代读者之心,而历代读者之心随生随灭,现已不复可寻;二则见之于评点家的批评文本,批评文本俱在而文心可觅。本论所作的研究就是对评点家阐发出来的“文心”作现代的读解。所谓现代的读解有三方面的含义:尽量客观地重构评点学即古人的批评体系;进而推究古人的应用的美学思想和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阐释评点学可能具有的现代意义。笔者虽然无可避免地使用今人的逻辑方法,但也期望此一逻辑框架能够清晰地勾画出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轮廓,这项作于评点学产生三百余年之后今人的“复原”工夫,不免带有研究者本人的思维痕迹。但笔者也本着求真问学的初衷,小心读解,尽量避免穿凿附会,以求切近古人的本心。在读解古人的批评文本的时候,存

在若干方法上的问题,需作解释。

古人的批评文本和它的文学文本存在异乎寻常的紧密关系。今人的批评由于采取西式的逻辑论述的框架,这种方式重在本身的逻辑自恰,批评文本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但小说评点却连这种相对的独立性都没有。因为古人采取的批评形式使它就像是寄生在小说文本里面一样。寄生一词并不仅指形式上评点附着于小说文本,它离不得小说文本,而且更重要的是批评文本的释义往往需要结合、参照小说文本才能语义完整,并获得理解。稍为离开小说文本而只从批评文本的字里行间去推究评点家的释义,很可能不得其解,或者随意附会。而对小说文本的理解,随着时代的远去,今人和古人可能相差很远。笔者在阅读古人评点时深感索解不易。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两种文本的特殊关系。今人对此点要有深入的体会才能避免无理忽略古人评点和随意附会古人评点的毛病,进而寻求索解之道。

评点本来是为阅读理解而创造的批评形式,当它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却遇到对它自身理解的困难。笔者认为今次能够带领我们穿越批评文本迷宫的引导,却是小说文本。而它当初也是一座迷宫,读者需要评点的引导才能穿越它。这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理解小说文本,需要借助评点;理解评点,反过来又需借助小说文本。借用版本考证的术语,这就是版本之间的“比勘”,各自都可以作为理解对方的工具。评点的释义固然有助于理解小说文本,但小说文本也有提示、补充、印证批评文本的作用。因为评点里的夹批不用说,就算回前和回后的总评,也是意(评点)随文(小说文本)生的。这“意”通常是不够完整的,需要参照小说文本才能补足古人的文意;或者由于年代久远,古人文意若明若暗,需要小说文本加以印证。因此,笔者在演绎古人评点的时候,会相当借重小说文本,以小说文本作为理解批评文本的重要参照。

古人评点和我们今人作文学评论一样,总是根据某些观念或美学原则进行的。这些观念或美学原则可能有充分的说明,但也可能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隐于批评文字的字里行间。尤其是那些已成圈内“共识”的观念和美学原则通常是不加说明的,而这些古人不加说明而又自认不言而喻的前提,正是构成了他们批评的基石。因此,一个批评文本的完整读解起码应当包含总结归纳批评文本的架构和推究其隐含的批评前提这样两个方面。其中,第一方面是比较经验性的归纳工夫,第二方面是分析发挥。但分析发挥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归纳的基础之上。归纳是否合理,对古人批评架构理解是否得当,是分析和阐述能否得当的前提条件。在对古人的批评架构理解错误百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合理推究其隐含美学原则的。古人不同今人,但今人很可能视古人如己,以想当然的态度看待古人。这就造成了读解时候的附会和凿空。相对来说,以己意附会古人,放言高论,是比较容易犯的毛病。原因是不肯下气力去弄清事物的原委,疏理其中的前后头绪。很难想象在不还事物本来面目的情况下,可以对它评头论足。我们必须看清事物的面貌,才可以推究它的肌理神气。对评点学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回到评点学中去,还它的本来面目,在这个基础上再发掘、推究古人未曾明言的观念前提和美学原则。如果说恰当理解古人批评架构是“取形”工夫,而推究隐含观念是“传神”工夫的话,“取形”与“传神”要有一个恰当的配合方能达出评点学的神貌。单有逼真的形则物象枯,而单求其神则画人变鬼。笔者在读解评点学的时候,深感两方面的轻重不易处理,然也只有尽力而为而已。

小说在古代属于委巷传闻、俚野琐屑之类,文体的地位根本无法与诗文相比。而对小说的评点更不被纳入谈诗说艺的“风雅”范畴,它与源远流长的诗话品评在许多文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性质相同的东西。在正统的观念下,说诗解颐已属赏析之闲雅,^⑭更何